



客家研究 探索

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出版

客家研究探索

江蘇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馬來西亞客家公會聯合會出版



客家研究探索

出版：马来西亚客家公会联合会

No. 30A, Jalan Mutiara Raya, Taman Mutiara,
Cheras 56000 Kuala Lumpur.

美编：林意慧

承印：Maju Jaya Indah Sdn. Bhd. (85902-U)

出版日期：2004 年 8 月

■ 非卖品——客联丛书系列〔8〕

 ❖ 拿督吴德芳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从唐宋逐渐形成的客家文化，是黄河的一条重要支流。

客家先民，原是黄河、江淮流域的汉人，由于种种原因，从唐宋时期开始大量辗转南迁，先在闽粤赣交界地区聚居，过后又向南方各省及海外播衍。中国的客家人口现今大约有4千500万人，另有数以千万计的客家人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与地区。

在前后1千多年的迁徙历史中，客家先民与迁徙途径地、定居地民众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吸收了各地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在精神特质、风俗、民情语言等方面的博大精深的客家文化。因此，了解客家人的动态，不只是了解中国的历史，也能看出中国社会未来。难怪研究客家学的外国学者认为：“不了解客家人就无法了解中国。”

事实上，客家人这支中华汉民族的特殊民系，早在100多年前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而近年来，更是掀起了一股国际性的客家研究热潮。目前，客家学的研究正方兴未艾。

可以说，“客家”魂萦梦绕地牵动了许多人的心魄，其中客家人独具的精神特质，更令世人刮目相看。

客家精神可说是客家人的支柱。客家精神包括（一）坚强的团结心；（二）保存文化、传统的信心；（三）重视教育；（四）进取尚武的精神；（五）对政治有极高的意识；（六）女性具备勤勉的美德。客家精神可谓非常丰富，其核心在于团结和奋进，这在客家迁徙史和客家文化诸方面，都有极其特出和具体的表现。

尤有进者，客家先民自身团结的精神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正是这种向心力使他们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把中原灿烂的文明带到南方播衍而不被迁徙地的土著同化。

此外，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特质，还表现在对异族文化的博采和涵化上。因此，严格来说，今天的客家，并不单靠入迁的中原汉人的自身繁衍，而是经过与当地民族融合而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其他民系迁入客家居地而被同化成了客家人。

值得一提的是，客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文化的精华；长期的迁徙史又养成了兼收并蓄取其长、开拓进取而不保守的作风，从而让客家民系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有关客家人，我认为英国学者艾德形容得很恰当：“一般而言，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保守、守旧的，唯有客家人是例外，他们是革命性的，充满进取的精神。典型的客家人是勤劳、刚毅、爱国又热情。”

的确，在历史上客家人英才辈出，对中原文化向南分传播，近现代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都起了重要作用；在当代，客家儿女又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各国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创造出客家人的骄傲，令人们倍感客家人蓬勃的生机和无限的活力。做一个客家人，毫不委屈，不因为什么，只因为我们有足以自豪的文化。

总的来说，客家文化是既古老而又具连续性的中华文明，从它诞生至今，从未泯灭，有著强大的生命的韧力。在历史的长河中，客家文化同外来文化的撞击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使自身获得壮大和发展，这便是客家文化生生不息的全部秘密。

❖ 蘇慶華博士

馬新客家研究
的回顧與展望

目录

■ 目录	
■ 序	i
■ 马新客家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 苏庆华博士	1
前言	
小结：几点看法和建议	11
后记	14
客家研究计划”参考书籍会馆纪念刊	15
论文	19
专书	21
英文论文与专书	29
■ 砂劳越客家人拓殖及其 社经发展的考察 / 田成英	37
绪言	37
结论	51
注释	52
参考书目	52
英文书目	53
■ 客家文化·华人文化·全球文化 / 刘崇汉	55
■ 客家社团与文化事业	69
■ 马来西亚知知港客家人	82



马新客家研究 的回顾与展望

前言

马新客家研究，严格来说是起步比较晚的。在过去，零星几篇有关客家人物介绍、或各地客属团体、乡会概况、史略的文字，散见于会馆纪念特刊之中。而有关客家源流考的文章，则多摘录自己故罗香林教授的《客家源流考》之“经典”著作。罗氏“客家人的先民因受了边疆部族侵扰而自中原辗转迁到南方之说法”，迄今仍广泛被接受为“定论”。而学者如房学嘉等有关“客家人并不是中原移民。他既不完全是蛮，也不完全是汉”〔1995：2〕之论说，则鲜少于马、新二地之有关论著中涉及。虽然这些特刊所刊载的文章，一般都来得简略，但对从事客家学研究的学者们，在资讯方面却提供了方便。

现阶段的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客家研究之回顾

已故大马史学家刘伯奎先生，河婆人，是罗香林教授的学生。他长期住在东马的砂劳越古晋，曾经对廖帝聘〔1827-1893〕所创的真空教（俗称：“戒烟教”）加以研究，并出版了《砂劳越之真空教》一书。他也对十九世纪砂劳越华人两大公司的兴亡史实和1857年“石隆门华工事件”中（反殖战争）阵亡的首领（原籍广东陆丰县罗庚山）刘善邦的事迹，详加考究，于1988年出版了《十九世纪砂劳越华人两大公司》（1990年修订再版时，改称《十九世纪砂劳越华工公司兴亡史》）一书。文中专注于考究早期由西婆罗州坤甸（Pontianak）、三发（Sambas）等处，由陆路进入砂劳越的客家籍金矿矿工先驱和当年华人采金公司经历与殖民地政权在矿地主权上发生冲突后遭受镇压之悲壮历史钩沉。刘老的努力，对吾人了解客家矿工先驱在改变当时婆罗州部份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所发挥的影响力有一定的帮助。而前述的刘善邦迄今仍被尊为“砂劳越开山地主”加以膜拜。

田英成的《砂劳越华族社会结构与形态》〔1991年再版〕和《砂劳越华人社会的变迁》〔1999〕二书，虽不专注于研究该州的客家人，但因客家人大量集中于古晋、美里等地，书中涉及客家人的资料也颇值得参考。而饶尚东博士著“东马客家移民史略”〔1995：48-64〕及“东马客家人口之增长与分”〔1999：215-229〕二文，对我们认识东马砂劳越和沙巴二州客家人的移民史和人口及其分布等，提供了有用的数据和资讯。

而马来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子坚（Danny Wong Tze-ken）先生以英文撰述的“The Early Profile of a People：The Hakkas



in Sabah, 1882-1946”一文，是目前有关沙巴州客家人较深入的学术性论著。（按：该文收入Mohemmed Redzuan Othman等主编，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Jendela Masa:Kumpulan Esei Sempena Persaraan Prof. Dato' Khoo Kay Kim-书中〔2001：217-243〕）。氏在这之前已出版了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nt Society: 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Sabah一书。

有关西马的客家人研究，刘崇汉先生撰的“西马客家人”一文，对西马各州的客家人人口及其分布，客家人在西马的经济活动与城乡开发所作出的贡献，还有客家人的社团组织，客家人对教育的贡献，客家人的信仰文化与庙宇等方面，都作出了简要和有益的梳爬和论述〔1999：160-210〕。

颜清湟教授于1993年发表于《亚洲文化》第17期的“Early Hakka Dialect Organiza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1800-1900”（新马早期的客家人言组织）一文，追溯了客家人移民新、马两地的历史，并对早期客家方言组织的创立及其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其组织结构和领导人等方面的探讨和论述。

除了个别府、州、县级的客家“地缘”性组织和较晚时出现的“语缘”性组织（即客属公会）以外，尚有跨方言群或超帮群组成的“联合阵线”会馆组织，如广惠肇公会、广东暨汀州会馆等组织之出现。这种错综互动的机制和合作基础又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有关课题，某些文章稍有涉及，但未作深入探讨。就个人所知，由曾玲和庄英章合著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2000）一书，乃极为少见，如果不是唯一以个案方式，对此问题作深入分析的专著。曾玲又于《亚洲文化》第24期

发表了“坟山组织、社群共祖与帮群整合——十九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2000：123-137〕单篇论文。

麦留芳教授于1985年出版的《方言群认同——早期星马华人的分类法则》一书，虽不专注于客家人研究，但在早期各方言群的认同和互动方面，提供了厚实的理论根据和方言群研究之重要借鉴。

吴华先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间所编著、出版的《新加坡华族会馆志（共三册）》〔1975、1977〕、《马来西亚华族会馆史略》〔1980〕，为我们收集了丰富的血缘、地缘及业缘性团体、组织的资料。而林孝胜等合著的《石叻古迹》〔1975〕一书，则“将新加坡的古迹有选择地作深入而有系统的介绍”〔1975：3〕。全书收入26篇相关文章，并于书前冠之以林孝胜撰的“十九世纪星华社会的帮权政治”一文，作为该书的导言，以“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主主要领袖人物为经，以代表各方言群的庙宇、宗祠、会馆、书院、医院等建筑物为纬”，对“十九世纪星华社会各帮分合作（帮权政治和帮际关系）两层次的分析”〔1975：4〕。钟临杰博士于1985年出版的 *Social Change and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A Socio-Economic Geograph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ang Structure* 一书，也是沿著帮权理论架构对星华人社会的变迁进行研究的。

至于著名客家历史人物的论述，早期较为人热衷撰述的乃：

（一）原籍广东省梅县石扇堡人的罗芳伯及其于1777年创立于坤甸之兰芳公司。已故罗香林教授著的《西婆罗州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出版于1961年；曾铁忱撰的“罗芳伯开



府西婆的故事”，刊于1967年的《南洋客属总会纪念刊》。此外，刘伯奎、刘子政诸氏，均有较通俗性的文章著述罗芳伯其人。将高延（J.J.M.De Groot）著的《婆罗州华人公司制度》中译出版〔1996〕的袁冰凌博士，亦于1999年在《南洋学报》第54卷刊登了“罗芳伯与西婆罗州的开拓”一文。以英文撰述的相关论文，尚有Barbara Ward发表之“A Hakka Kongsí in Borneo”（1959）以及Wang Tai Peng于1994年出版的The Origins of Chinese Kongsí（按：该书乃作者约于20年前呈交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之高等学位论文）；

（二）霹雳州的甲必丹（Captain）郑景贵〔1821-1901〕及其四子郑大平〔1879-1935〕；胡子春〔1860-1921〕；

（三）檳城的张榕轩兄弟（煜南、鸿南）、谢春生、梁碧如、戴欣然、张振勋（号弼士）〔1840-1916〕；

（四）吉隆坡的丘秀、刘壬光、叶亚来、叶亚石、叶观胜；

（五）森美兰的甲必丹盛明利；

（六）吉打的甲必丹戴春桃等。

上述这些客家先贤的传略颇常见于会馆特刊中。当中，甲必丹叶亚来最受重视。除了纪念刊中有关他的事略外，李业霖与刘崇汉二氏分别于1997和1998年编著出版了《吉隆坡开拓者的足迹——甲必丹叶亚来的一生》及《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二书。美国学者Sharon A. Cartsens博士先后于1993和1998年发表了有关叶亚来的两篇论文，即：“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y in 19 Century Malaya: The Case of Yap Ah Loy”，及“From

Myth to History: Yap Ah Loy and the Heroic Past of Chinese Malaysians”。

此外，出生于缅甸，原籍福建永定县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先生〔1882-1954〕的传记也常见于客家先贤事略当中。胡氏亦名列刘大可著之《客家之光》〔1995：122-127〕一书。

另外，尚有康吉父著的《胡文虎传》〔1984〕，张永和著之《胡文虎传》〔1993〕以及Sam King著之Tiger Balm K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Aw Boon Haw(1992，Times Editions Pte. Ltd.，Singapore)三本传记体著作。相关的学术论文，尚有陈星南撰的“胡文虎思想初探”〔1998〕，郑良树的“胡文虎与新马华文教育”〔2000〕，王予霞的“胡文虎广告经营思想新探析”〔2001〕等。

另，王琛发〔1998：110-121〕和黄贤强〔1997：181-191〕也先后发表了有关槟城客家人的论文，即“槟城清代华人社会的客家人纪事”和“客籍领事与槟城华人社会”。黄氏的“十九世纪槟城华人社会领导层的第三股势力”〔1999〕一文，则谈到了十九世纪在槟城闽、粤两大势力之外的客家帮所组成的领导集团。

还有，祖籍大埔县，出生于砂劳越的马来西亚前内阁部长丹斯里拿督杨国斯所著的《自传》〔1998〕，对我们认识本地客家人的奋斗和政治经历，是很有价值的参考材料。梁纯菁发表于第五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之论文，乃以本邦著名河婆籍锡矿家，已故丹斯里张国林先生〔1913-1994〕为例，探讨华人企业家与东南亚的课题。朱晋韶先生撰祖籍永定县的“锡矿业巨人胡曰皆”及原籍广东梅县的“橡胶业大王李莱生”二



文〔1998：283-303，307-341〕，也提供了另两位本地商业界闻人的传记，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有关马、新客家人的信仰文化及其所崇祀的神明当中，最为人熟悉的乃三山国王。《柔佛州河婆同乡会庆祝十六周年、马来亚河婆联合会第七届大会纪念特刊》〔1994：179-274〕中收入《霖田祖庙论文特辑》，有助于深化马来西亚的三山国王崇祀研究。该刊也收入了德国汉堡大学退休教授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于1993年国际汉学研讨会上发表之相关英文论文“The Sovereign of the Kingdoms of the Three Mountains, San Shan Guowang 三山国王。at Hepo and in Southeast Asia: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1994：537-539，598-606〕。

前引刘崇汉文〔1999：201-207〕，也约略谈到了其他本地客家人所崇祀的神明和建立的庙宇，包括：供奉五代道士谭山肖的谭公庙，供奉本邦华族拓荒先驱人物的大伯公庙，供奉原籍广东惠州，死后被神化之甲必丹盛明利（仙师爷）和叶四先贤（四师爷）的仙四师爷庙，还有供奉原籍惠州紫金的钟万之钟万仙师爷庙等。温故知著之《仙师爷与师爷庙》一书〔1987〕研究散布于加影、芙蓉、万挠、马六甲、文冬等诸矿区之仙四师爷庙群的一部著作。对进一步研究崇祀本土被神化的人英仙师爷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有关客家人的婚嫁习俗和丧葬文化，在马、新两地进行实地考察的田野报告恐怕还不多见。

黄顺炳等主编之《客家风情》一书〔1993：101-117〕第3章第2、3、4节有关“婚姻寿诞喜庆”及“丧葬礼俗”及“生产习俗”之客家风俗习惯文字，可当研究本地的互相习俗研

究借鉴和用作比较。本书目中尚列有刘善群著《客家礼俗》一书，可供参考。丁启满、刘世旭、曾一书〔2001：181-187，210-216，217-231〕诸文，亦可供比较和参考。

有关客家的饮食文化方面，客家的擂茶近年在本邦被冠以“健康、保健素食佳品”之美誉而风行一时，成为超越方言群，甚至族群之美食。此外，客家人的酿豆腐、芋头扣肉、算盘子等传统之美食经已驰名于中华饮食界，成为众人之所爱。刘劲峰的“客家擂茶源流小考”〔2001：381-383〕一文及其他《纪念特刊》中，亦偶见辑有相关之介绍性文字，可供研究之参考。

有关客家方言之研究，本书目列了罗美珍、邓晓华著之《客家方言》一书〔1995〕，李如龙主编之《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一书〔1999〕中，收入李氏本人所撰有关“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及其历史背景”及“南洋客家人的语言和文化”二文，还有练春招的“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士乃镇的客家方言”一文。由于本人非语言学专业出身，在拟议中的马新客家人研究中，只打算浅尝而止，或在客家方言受本地文化影响之词彙方面作些整理的工作而已。

至于对马、新两地客家妇女的研究，目前也不多见。房学嘉所著的《客家源流探奥》一书〔1995：255-296〕，提供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客家妇女与客家源流”的问题。作者是“从客家妇女的种种典型特征入手”，用新的角度去证明他于全书中一贯主张之“客家共同体的主体是古越族遗民”之论点。而李泳集的《性别与文化：客家妇女研究的新视野》一书〔1996〕，则是“以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结合历史



文献……，探讨客家文化对客家妇女行为的影响以及透视客家女性如何作出自己的选择”。

作者也通过华南地区不同族群妇女之间的比较，挑战从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角度来讨论中国妇女问题的方法论（引自该书“内容提要”）。参研房、李二氏上述有关客家妇女之研究，将有助于开展多角度、跨学科的马、新两地客家妇女课题之探讨和研究。在性别学（Gender Study）构成当今主流学界研究之一的趋势下，过去受忽略的马、新客家妇女研究，肯定将成为两国客家学的重要研究项目之一。配合世界客属第十五届恳亲大会在吉隆坡举行而出版之《马来西亚当代客属艺术家作品集》，当中有好些优秀的客籍女书画家，或可作为本地女性研究的起点。黄秀爱于1997年发于《亚洲文化》第21期的“客籍作家与战前新马华文文学”之论文，亦可借以针对两国华文文学的客籍女性作家作品作为研究客家妇女的一个面向。

在客家研讨计划下，宗乡活动全球化的现象，是另一个值得加以探讨的重要面向。国际性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自1971年9月在香港举行第一届大会以来，迄2000年11月在福建省龙岩市隆重召开，已经进入第十六届（按：第十七届大会将在2002年于印尼雅加达举行）。

而第一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由香港中文大学之中国文化研所，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人类学系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之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学研究所于1992年9月24-26日联合主办之后，迄2001年3月18-19日又于四川成都成功举行了“第七届国际客家研讨会”。